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

——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陈曙光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关键词] 中国模式; 中国道路; 西方话语; 方法论误区

[中图分类号]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4-0031-07

在国际话语场,部分西方学者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任意解读“中国模式”。究竟如何理解中国模式,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看法才能搞对头。

一 “一”与“多”的统一

“一”与“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多包含于一中,正如一包含于多中一样”^[1]。一与多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要坚持“一”的主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既要在多元中寻找一致,在多样中谋求共识,又要在相似中寻找差异,在共相中发现殊相。

社会主义是“多”和“一”的统一体。正如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一种味道算不上佳肴,一种颜色说不上五彩,一种模式也构不成世界。列宁曾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3]250}。习近平也指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

的。”^[4]任何国家都只能走切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就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一”与“多”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5]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元素”、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是植根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今天,部分学者固守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秉持“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出路”的先验逻辑,以西方模式否定中国自由选择的权力,以苏联模式否定中国自主创新的权力,这就违背了“一”与“多”的辩证法。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福山,他宣称,西式“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6]。“福山主义”所念兹在兹的是何时能把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巨人纳入西方的版图。但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能够如他所愿,至少中国是如此。2009年,福山在反思金融危机时也慨

[收稿日期] 2015-07-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思想研究”资助(编号:15ZDA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学术话语的基本问题研究”(编号:NCET-13-0433);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陈曙光(1975-),男,湖南浏阳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叹,“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7]。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式自由民主模式并没有普世性,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2009 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说,西方的民主价值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教义,它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其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没有终结人类对现代化的探索,西方总是试图扮演“上帝选民”,总想去“拯救”别人,其结果是损人不利己。正如美国现代化专家 C. E. 布莱克强调,“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8]现代化的方向是相似的,但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各异的。与西方道路相比,中国道路有着太多的独特性,而这正体现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那种以西方模式为标准来裁判中国道路合理性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合乎理性的。

二 “变”与“稳”的平衡

“变”与“稳”的关系,也即“变”与“不变”的关系。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在绝对的变异中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不变的东西,这就是辩证法。

“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坚持了“变”与“稳”的辩证法,有所变,有所不变;能变则变,不能变则稳。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变不得,丢不得;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学不得,捡不得。邓小平在接见港澳国庆观礼团时指出,中国有“大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城市改革也是变,翻天覆地的变化”^{[9][73]}。面向未来,中国模式也必须同样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不能不变,也不能瞎变。改革即是变,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时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能乱改,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0]。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 2008 年 1 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11]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战略定力,不为外部的噪音所扰,不能乱改,不能瞎变。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须臾不能丢、时刻不能忘的立身之本,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能丢、时刻不能忘的

强国之路,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

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定位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这就背离了“变”与“稳”的辩证法。这样的学者不胜枚举,代表性人物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亚生,他认为,“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才是中国模式的隐秘内涵,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12]¹⁶⁰。还比如,西方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指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13]¹⁹总起来说,这些学者违背“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他们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经济,公有经济比重大幅降低,发展股票、证券等等,而没有看到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变,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因而对中国模式做出错误的估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 “质”与“量”的互补

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量”的规定性不同于“质”的规定性:“质”与事物的存在具有直接同一性,“质”存在,该事物就存在;“质”一旦消失,该事物亦不复存在。“量”与事物的存在不具有直接同一性,即在一定的范围内,“量”的增减并不影响某物之为某物,并不会改变事物的“质”。认识某一事物,既要把握事物的量,也要把握事物的质。

分析“中国道路”,既要进行定量分析,也要进行定性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发展迅速,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提升,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所代替,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是,非公经济在“量”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没有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十五大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14]当然,“所谓比重减少一些,也应该有个限度、有个前提,就是不能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15]也就是说,量的变化必须有一个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就会导致质的变化。

西方一些学者违背“质”与“量”的辩证法,混淆“质”与“量”的界限,将量的变化等同于质的变化,

对“中国模式”做出错误的性质判断。比如,美籍华裔学者黄亚生通过对中国经济成分和发展指标的分析,发现了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已大大降低,私营经济所占比重已超过国有经济,因而得出“中国早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结论^{[12]160}。西方一些托派和毛派学者也认定,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目前公有制的比重已经大大低于私有经济的份额,而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他们认为,市场改革只要一启动,就会陷入一种“湿滑的斜坡效应”,这时想转向是没有可能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和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控制”^{[13]9}。这些学者都将量的变化夸大为质的变化,从而得出片面的结论。其实,判断中国模式的社会性质绝不是简单用几个数字可以说清楚的,正如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阿尼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其理由一是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鼓励;三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四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又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16]。尽管托尼·安德列阿尼的看法不一定全面,但其观点还是值得重视。

四 “中”与“西”的互鉴

“中”与“西”的辩证关系,放大来说,也即“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没有民族性的存在,无所谓世界性;没有世界性,何谈民族性。

“中”与“西”的辩证法,其要义在于,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东西,绝不意味着可以“套用”于中国。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耦合之处不过是“貌合神离”,比如,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私有经济不同于西方掌握经济命脉的私有经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同于西方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不同于某些国家在开放中沦为“依附”于他国的“香蕉共和国”,中国的自由贸易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马丁·雅克在与威尔·赫顿辩论时指出,西方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包括中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将成为而且应该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克隆体。然而,这是一种十足的谬论。中国不存在成为“西方化”国家的可能性^[17]。“中国模式”不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中国模式”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模式的某些合理成分,目的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不是为了建设另一种资本主义。

“中”与“西”的辩证法,其要义还在于,既承认“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又不搞模式输出。“中国模式”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18]。中国模式“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扭转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19],点燃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这是“中国模式”不可磨灭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20]。但是,“中国模式”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出口”到西方,中国从来不搞模式输出,从不追求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统治世界。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之所以广受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试图把一种“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强加给那些不同结构、不同体制和不同需要的国家。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始终保持了鲜明的理性,中国反复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3]319}。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与中国进行交往的吸引力与其说是中国的‘模式’,不如说是中国不会推广任何模式”^[21]。

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作西方模式的复制品,这就背离了“中”与“西”的辩证法。比如,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22]128-133}。黄亚生认为,中国在成功的方面与西方国家是“一模一样的”,中国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选择适合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23]。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无非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是抄袭西方的结果,是向西方学习的另一个成功样板。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内涵,中国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定力,不搞西式政治制度、不对华盛顿言听计从;始终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不搞全盘私

有化、不搞完全自由化;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不搞新自由主义、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等等,以上都是中国特色,这些都是有悖于华盛顿共识的。

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全盘否定“中国模式”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也背离了“中”与“西”的辩证法。比如,著名的世界体系论者阿瑞吉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度,具有非常独特的地缘优势、历史优势、文化优势,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大国,如印度——的参照模式,取决于这些历史和地理的特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再现。……中国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因为这影响着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要作为别国参照的模式。”^[24]¹⁹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学者科尔奈也认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模仿!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文化传统也与别国截然不同。”^[25]其实,否定“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是短视的,其方法论根源在于将“中”与“西”的界限扩大到隔绝的地步,不懂得“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一辩证法。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它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6]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也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27]。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既不要刻意回避,又不要讲过头话。

五 “主流”与“支流”的兼顾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主流、主要的一面,也有支流、次要的一面。认识客观事物,两面都要看,不能只看一面,要避免任何一种片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两面: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好的一面和不那么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和不那么成功的一面。主要的一面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前所未有,中国经济规模的变化前所未有,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的进步前所未有,中国市场化、国际化的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的变迁前所未有,中国贫困人口减少的规模前所未有,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前所未有。非主要的一面表现为:资源环境恶化的挑战前所未有,贫富差距拉大的挑战前所未有,城乡差距拉大的挑战前所未有,社会矛盾激化的挑战前所未有,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前所未有,国际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挑战前所未有,腐败蔓延的挑战前所未有。这“两面”

都要看到,是“两面”而不是“一面”,“要讲两句话”。同时,这“两面”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其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非主要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抓主要的一面。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又要勇敢地直面问题。“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和追捧,我们更应当自警自省自检,如实估量自己的成绩,如实查摆自己的问题,决不可自我泄气,也决不可自我膨胀。

一些西方学者违背“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将支流夸大为g主流,从而对“中国模式”的前途做出悲观的预测,“中国模式失败论”就是典型的表现。比如,IFF 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就曾质疑说,“苏联也曾经获得过高速增长,而且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崩溃的迹象之前,它也一直当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也有着与前苏联类似的扭曲,它可以避免同样的突然崩溃的宿命吗?”^[28]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存在前所未有的社会 and 地区不平等、腐败、言论自由、民主赤字、生态问题、社会不稳定和法治进程等问题,这种发展模式被认为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不可持续^[29]。“中国崩溃论”的典型代表沈大伟、章家敦也是只看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忽视中国取得的成绩,将问题扩大化、绝对化,这就是片面的。其实,这些学者往往都只看到“中国模式”隐含的问题,而无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因此得出中国也将步“苏东”突然崩溃的后尘的结论,这恐怕就没有正确把握主流和支流的辩证法。确实,中国的问题和矛盾很多,但不能以此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如果对中国成绩和问题的分析,不分主流与支流,就难以对中国模式的性质和趋势做出清醒、全面、准确的定位和判断。

六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而不是历史与逻辑相一致。不是历史服从逻辑,而是逻辑服从历史;不是用原则来匡扶事实,而是依据事实来修正原则;“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30];事物的特性不是从抽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而是从事物本身去寻找;不是从思想出发去裁剪现实,而是“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31];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解释“中国道路”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果;不能从原则出发来裁剪中国,不能用逻辑来推导事实。抽象的概念和原则不能成为评判中国道路的标准。

准,相反,应该从中国的实践中发展出新的概念和原则。概念和原则应该产生于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西方有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这是以逻辑裁剪现实的典型表现。“历史终结论”的创立者福山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至少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32],中国模式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纽约时报》社论专栏作者克里斯托弗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伴随而来的可能就是中国成为军事预算增长的国家;中国正处在由一个弱者变为强者的进程之中,将有机会去做它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它必须做的事情”^[33]。克里斯托弗这里所说的“想做的事情”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西方国家崛起后一直想做且始终在做的事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确实,“恃强凌弱”、“国强必霸”——这是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逻辑,500年来几无例外,而至于这个逻辑能否套用于中国,则不是一个其意自明的问题。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强盛的历史时期远超过西方,但中国从未走上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扩张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国强必霸”的西方诸国都无法摆脱“霸极必衰”的惨淡结局,都没有好下场,中国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历史已经证明,强大的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中国人强身是为了健体,强国是为了富民。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9]56}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谋求输出价值观念,不谋求出口中国模式,不谋求中国文化统治全球。这已为西方有识之士所称道。美国哈佛大学里金纳·艾布拉米认为,“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定论^[34]。21世纪,究竟“是北京说了算?还是华盛顿说了算?”^[35]斯蒂芬·哈尔珀的这一设问未必具有合理性。未来的世界也许不再依靠一国说了算,而是有事大家商量着办。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打破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代的终结来临得就越快。

七 “局部”与“整体”的呼应

一切事物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各个局部构成整体的组成部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法在于,局部

离不开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局部;整体统率局部,局部服从整体。认识事物,既要认识局部,也要认识整体;既要通过局部来把握整体,也要通过整体来把握局部。

“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既要从局部来把握,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体性的视角来把握。中国模式包含经济发展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管理模式、外交政策模式等诸多独创性内容,不能以偏概全。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就从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中国模式,他指出: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久加诺夫的这一概括也许不够系统全面,但其方法论原则无疑是正确的,理解中国不能偏之一隅。我以为,“中国模式”的整体性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维度来分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政治领域,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相结合;思想文化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社会领域,坚持公平正义,把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际关系领域,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构建和谐世界。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实际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以偏概全,把局部的实际夸大为整体的实际,就必然对“中国模式”做出片面的判断。

西方一些学者囿于经济的视角解读中国模式,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模式,而将中国的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社会管理模式以及其他方面置之不理,这就违背了“部分”与“整体”的辩证法。比如,西方部分学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基于冷战的思维,基于西方文化优越论的价值预设,他们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非常不乐意将中国的成功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挂钩,这种狭隘与偏执已经到了无法理喻的境地,我们难道可以认为西方模式的成功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政治制度毫无关联吗?!比如,美国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拉迪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得益于五个因素,即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不断开放;高储蓄率;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大规模转移以及多年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36]从拉迪的这五个因素中,你找不出与中国有什么关联,你找不出这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西方部分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模式,尤其不愿意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来

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27]没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正常的经济活动都难以进行,更谈不上吸引国际资本了。其实,中国能够创造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因此能够正确地制定和成功地执行体现国家利益的战略”^{[22]1-2}。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与中国努力营造的良好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周边环境大有关联。

八 “历史”与“现实”的贯通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大化流转,“历史”、“现实”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现实有历史的影子,历史对现实产生影响。历史孕育着现实的基因,现实来源于历史。从历史到现实的镜鉴和启迪,从现实到历史的回溯和反思,都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途径。历史不能被割断,也不能虚无化。以历史否定现实的保守主义思潮,以现实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都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至今 60 多年的历史既是一个延续的进程,又是一个发生了伟大转折的进程。历史的延续和转折是历史的常态。“中国道路”既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否定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就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时期也不是否定和抛弃的关系,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它们共同孕育了有别于西方和苏联的中国模式,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如果没有 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如果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形成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不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交通等基本建设,改革开放是难以起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系,他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

过去。”^[37]

现在,西方一些学者有意制造毛邓之间的对立,以毛来否定邓,以邓来否定毛,这就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比如,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背弃了毛泽东时代的价值和理想,“‘中国模式’与其初衷及理想相去甚远: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38]。在这位法国学者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是互不相容的,要么选择社会主义,要么选择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再比如,西方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的成功是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伤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不清^{[13]26}。其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历史是不能隔断的,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丰厚“遗产”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宝贵财富。他们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告诫“局内人”不能因为历史的苦难而隔断历史、否定历史。阿瑞吉认为:“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革命早前所取得的成就。1978 年到 1984 年农业生产的发展确实与改革有关系,但这仅是因为它们是在建筑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之上的。”^{[24]373}他们还认为,毛泽东留下的“革命遗产”除了制度成果、物质成果,还包括思想成果,最明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留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成功实现思想路线的转变,成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39]。著名经济学家阿明还指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和现代化事业也塑造了中国人民,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中国人民相比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要更为自信和富有斗争精神^[40]。今天,如果因为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而否定前人,这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表现。

总之,“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究其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方法不对头是关键所在。正确解读中国模式,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是前提。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待中国模式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04.
- [2]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8.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讲演[N].新华每日电讯,2014-04-02(2).
- [5]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N].人民日报,2013-01-06.
- [6] [美]弗郎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1.
- [7] [美]弗郎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J].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
- [8] [美]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87.
-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3.
- [10] 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10-08.
- [11] 转引自詹得雄.国外热议“中国模式”及其启示[EB/OL]. (2008-03-27) [2008-07-16].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8-03/27/content_7867764.htm.
- [12]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3] Martin Hart—Landsberg,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J].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4.
- [1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
- [1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2.
- [16] [法]托尼·安德列阿尼.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J].思想(法国),2005(1).
- [17] [英]马丁·雅克,[英]威尔·赫顿.在中国迈向全球巅峰之际,西方统治地位的寿数将尽了吗?[N].卫报(英国),2009-06-23.
- [18] [新加坡]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前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4.
- [19] 肖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挫折”与“新局面”[J].当代世界,1999(11):4-6.
- [20] 袁银传,马晓玲.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J].湖湘论坛,2012(2):31-34:39.
- [21] [英]肖恩·布雷斯特林.“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1):157-162.
- [22] 转引自何迪,鲁利玲.反思“中国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23] [美]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4.
- [24] [意]乔万尼·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25] [匈牙利]科尔奈.根本没有“中国模式”[J].社会观察,2010(12):102.
- [26] 陈锦华.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N].人民日报,2011-07-05.
- [27] [新加坡]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9(5):20-28,204.
- [28] [美]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165.
- [29]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J].国外理论动态,2011(7):15-27.
- [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 [3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
- [32] Nancy Birdsall,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 – 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J].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 [33]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J].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3.
- [34] “中国模式”挑战传统理论——外国专家评价“中国模式”之一[EB/OL]. 人民网-国际频道,2009-05-07.
- [35] 参见[美]斯蒂芬·哈尔珀.北京说了算? 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M]. 八旗文化(台北),2010.
- [36]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仍是投资驱动型[EB/OL]. (2006-06-22) [2015-05-28]. <http://www.Caijing.com.cn/2006-06-22/10009063.Html>.
- [37]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N].人民日报,2013-12-27.
- [38] [法]托尼·安德烈阿尼.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J].国外理论动态,2008(5):67-75.
- [39]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537.
- [40] Samir Amin. China, Market Socialism, and U. S. Hegemony [J]. Review, 2005, 28(3).